



范佩貞博士辦公室
Dr. Angela Fan's office



Harvard's Class Gap : Can the academy understand Donald Trump's "forgotten" Americans? 哈佛的階級差距：學術界能理解唐納·川普“被遺忘的”美國選民嗎？

美國的沿岸菁英與白人工人階級之間的差距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然而到了2016年11月9日凌晨，美國的知識分子才驚覺自己竟然已經在憤怒和挫折的浪潮被溺斃。哈佛大學學生的對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支持率相比可能達到80%對6%的差距，哈佛大學教授的競選捐款中有大概91%都流向柯林頓——不過上述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在這次競選中明顯且成功地將勝利結果賜予許多知識精英們所憎惡的人。如果某些菁英大學是聰明的高中生開始享受長久被嘲弄為書呆子的出頭天——「書呆子的報復(revenge of the nerds)」的地方，那麼2016年的選舉日所呈現反倒像是「知識分子的罪有應得(comeuppance of the intelligentsia)」。

對於一些人來說，選舉所顯露出來的差距提升或開始了大家對支持川普的愚昧選民所有的精神優越感的理解。他們的候選人進行了醜陋、可怕且駭人聽聞的競選活動，主張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聲稱由於聯邦法官是墨西哥裔美國人於執法必定持有偏見，以及在鏡頭前吹噓自己有能力進行性侵犯...。對於許多人(包括作者本身)來說，投票給川普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數百萬美國同胞卻仍是投給了川普，而在民主國家，理解其原因是至關重要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一直是美國歷史上的強大動力，在過去的選舉中，有大量的證據呈現玩弄它們的效力。但正如時事評論家範·瓊斯(Van Jones)所指出，人們出於「複雜的原因」投票，並指出「如果你將票投給了偏執者，你本身就是偏執者」這樣的說法其實是過分簡化。例如，為何奧巴馬支持者轉向川普？難道千百萬女性川普選民贊同性別歧視？為什麼白人工人對於被政治階層所「遺忘」(forgotten)的這樣的說法覺得有吸引力？正如記者哈羅德·邁耶森(Harold Meyerson)所寫，白人工人階級的選民們可能已經注意到，「可嘆、應受譴責的(deplorable)」是希拉蕊·柯林頓曾賦予他們的形容詞，但她怎麼從不曾如此形容過華爾街那些扼殺經濟的銀行家？

Harvard's Class Gap

Can the academy understand Donald Trump's "forgotten" Americans?

Harvard Magazine MAY-JUNE 2017 [RICHARD D. KAHLENBERG](#)



羅伯特·科爾斯(Robert Coles)：對白人工人階級的同理心

學術界有必要去瞭解此次選舉中白人工人階級的行為。在美國一個這樣的自制系統內，每一個人的意見都有價值，所以去理解有那麼多美國人為何如此沮喪導致於將選票投給這樣一個傾向會毀滅這個系統的候選人，是非常重要的。

學術界本身是很好的起點。1965 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書，目前已榮譽退職的優秀精神科教授羅伯特·科爾斯對促進對 Middle Americans (註 1)瞭解的貢獻無人能及。科爾斯以其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獲獎的*危機中的兒童(Children of Crisis)*聞名，曾榮獲總統自由勳章，不過，科爾斯最大的才華和能力是在於進行研究和寫作有關階級時，能超越種族膚色界線把人連結起來。

科爾斯的母親來自美國中西部，父親是英國移民，美國的傳統是奴隸制，英國植根於其封建歷史，因此，科爾斯中成長環境中同時存在種族不平等感的美國意識，以及階級不平等感的英國意識。幾年前科爾斯告訴我，他的父親在一個人們「知道自己屬於什麼階級的社會中長大，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這個字，在社會學領域的精確度，是比我們現在在這個國家中對自己的定位傾向或歸屬感高的。」

科爾斯於 1950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接著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最終專科是兒童精神病學。1960 年代初，在密西西比擔任空軍醫生一段時間後，他對學校廢除種族隔離的爭論感到興趣盎然。科爾斯聲名大噪是從在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中撰寫的一篇文章開始，這個故事描述了他和幫助新奧爾良學校聯合面對險惡的白人敵意的勇敢六歲黑人女孩露比·畢爾吉斯(Ruby Bridges)的交流互動。科爾斯在文章中描述露比即使受到其他白人父母充滿憎惡歧視的大聲疾呼所折磨，她卻會默默地為那些白人祈禱，對此他感到十分震驚。科爾斯隨後讚揚了露比未受過正規教育的父母，因為他們所養育的孩子比受過高等教育的孩子擁有更多的同理心和道德力量。

1968 年，科爾斯擔任自由主義英雄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非正式顧問。(科爾斯撰寫了這位候選人被暗殺前所發表的最後一次演講)。科爾斯對羅伯甘迺迪能夠同時連結美國黑人和白人工人階級的方式非常著迷，不僅美國黑人感激甘迺迪對公民權利的熱情支持，由於甘迺迪訴諸的具吸引力的共享經濟利益，某些白人工人在四年之前投票贊成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擔任總統也轉向甘迺迪。科爾斯告訴候選人：「選舉與真正的階級政治有關。」科爾斯說，甘迺迪之所以能吸引中低收入的白人，是因為這些白人認為，「這個人不會藉由利用我們來向那些富有的哈佛類型的人展現他是多麼偉大的人物(而把我們標記為落後或退步)。他或許會為他們(非洲裔美國人)，但他也會為我們。」

甘迺迪遇刺前幾年，科爾斯的研究引起了爭議。他的露比·畢爾吉斯故事及他與甘迺迪的關係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但是他決定花時間與那些深感被忽視和忽略的白人藍領家庭打交道，並不受自由派知識分子歡迎與接受。七十年代初期，他出版*美國中部：驕傲與忐忑(The Middle Americans: Proud and Uncertain)*，以深刻的同理心解釋白人消防員、工廠工人、店主、農民的經歷。科爾斯學術界的許多朋友詆毀他的新研究，不明白為什麼科爾斯願意低就將自己的才華能力投入到一群被許多進步者視為極端保守、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美國人當中。

在 1970 年代中期，科爾斯再度為許多哈佛自由主義者跨越了界限。當波士頓因為法院下令廢除種族隔離的校車政策而群情激動時，哈佛社區的大部分人都驚呆了，因為白人工人階級的人們把磚頭扔到即將載著黑人學生到白人學校的校車上。隨後科爾斯譴責此暴力事件，但引起了巨大騷動當科爾斯表示自己能理解這項強制性的校車政策所引起白人工人階級的厭惡和不滿，而且這項政策遺漏了衛斯理、牛頓和劍橋等更富裕的周邊社區範圍。

1974 年 10 月，*波士頓環球報 The Boston Globe* 幾乎將整個專欄內容投入在科爾斯的採訪報導。科爾斯說：「我認為校車政策是一起醜聞。」「但我不認為這次事件應該全部怪罪於工人階級，反而應該跨越這些界線，郊區的人們也應分擔.....」科爾斯認為，「終極的現實就是階級的現實.....這才是真正的鬥爭。」他說，工人階級的白人和黑人都「面對不公正的待遇.....這兩個族群都被忽略，都被那些富裕的白人瞧不起。」

科爾斯並沒有把波士頓的藍領白人浪漫化；科爾斯說，這些藍領白人會厲聲叫罵在禮儀社會中不會使用的種族稱號，「我不認為所有專家.....這些社會科學家和像我一樣贊成融合的人，應該去向波士頓人布道說教...直到我們成為這其中的一部分」對於居住在富裕郊區的人們，科爾斯說：「他們的生活和心思單純乾淨，可以承受這種長期、仁慈、冷靜的觀點。但如果人們不瞭解這是一種階級特權，天哪，那麼其實他們根本什麼都不瞭解。」

二十年後，科爾斯回憶自己在*中部美國 The Middle Americans* 關於校車政策和對白人工人階級善意對待的評論時，說這構成了「我這一生中因為所言而陷入困境的兩個時間點。」「那之前我從未見識過，有些值得讚揚、煞費苦心的人會試圖去理解不同種族(強調語氣)背景人群，而有些人的輕蔑藐視可以隨後動員起來而且表達得如此生動、歷歷在目。人往往可以不付諸努力去理解、不抱持寬容善意去談論和自己相同種族的工人階級。」

作為 1980 年代初的大學生，我在科爾斯的傳奇課程“社會反思文學”中吸收了他關於種族和階級的思想，研究了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到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 Connor)等作者。這堂被稱作“有罪 101”的課程常吸引到憤世嫉俗的學生前來揶揄奚落，但是也吸引很多其他學生們紛紛湧入。我記得有一次上課的時候，哈佛大學部學生所編寫的幽默期刊*哈佛諷刺家(The Harvard*

Lampoon)的一個成員衝進房間，模仿科爾斯的開始講課風格。科爾斯要求那位學生離開，然後在痛苦的沉默中佇立，顯然非常沮喪。過了一會兒，一位學生從後排大喊，「博士，我們愛你！」接著四百名學生跳起來，開始瘋狂猛烈地鼓掌。

日後我繼續修科爾斯在哈佛出名的“基督教反思文學”這門課，透過和科爾斯長時間討論我的畢業論文更加認識了他，我的論文是關於羅伯特·甘迺迪在 1968 年總統競選之時，同時關注白人工人階級和黑人的領導能力。作為法學專業的學生，我也修了科爾斯的“狄更斯與法律”課程，用 *荒涼山莊*(*Bleak House*)、*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小說討論律師在社會中的角色等重要議題。科爾斯後來為我 1992 年的新書有關以更寬廣角度檢視以上議題的毀約：*哈佛法學院回憶錄*(*Broken Contract: A Memoir of Harvard Law School*)撰寫前言。科爾斯呼籲以更大角度關注影響黑人和白人的階級問題，這也是過去 30 年來我寫作的檢驗標準，因為我試圖將公民權利補救辦法應用在更廣泛的階級不平等問題——如 K-12 教育、高等教育和就業法。

在寫一本關於學校整合的書籍時，我發現科爾斯對波士頓的看法觸及了一項重要的教育事實：孩子同班同學的社會經濟狀態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 比起同學的種族，對孩子成績的影響還要更加深遠。(註：在當今，教育 32 州 440 萬學生的一共 100 個學區和特許學校，已正按社會經濟狀態實行融合政策。)在我的另一本書中，科爾斯的觀點促使我提出如同「民權法案」的觀點，除保護人民免受基於種族等因素的歧視，也應該包括試圖以建立組織方式進入中產階級的所有種族族群。科爾斯所強調的經常未被提及的階級傷害，也幫助我思考了關於大學招生中的平權法案和校友子女偏好(legacy preferences)的書籍(見下文)。

今日學術界存在的不平等

時至今日只有少數哈佛大學的教授正在強有力地撰寫關於階級的文章，包括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斯達克科爾(Theda Skocpol)。在其他地方，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最近在 *白人垃圾：揭露美國 400 年階級歷史*(*White Trash: The 400 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一書中探索了經濟不平等的影響，柏克萊大學的阿里·霍奇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 *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國右翼的憤怒與哀悼*(*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一書中描寫了關於保守派白人。

不過上述都屬於異常值。在社會學家中，種族和性別的研究遠淹沒了階級研究。伊利諾斯大學的沃爾特·貝恩·米克爾斯(Walter Benn Michaels)曾經觀察到：「雖然在美國公眾生活中，沒有比我們並不喜歡談論種族還更常見的言詞評論，可是沒有任何言詞評論……是更加錯誤的。」「其實，我們喜歡談論種族。而且在大學裡我們不僅要談論種族，還要寫關於種族的書籍和文章，我們會教授和修習相關的課程，安排我們的入選方式，以便將種族部分也考慮在內。」米克爾斯建議說，我們談論種族，以避開談論階級。

舉例來說，勞動法就是用來處理階級不平等中的大問題。教授這個課題對於像德瑞克·包克(Derek Bok)和阿奇博·考克斯(Archibald Cox)這樣年輕的哈佛學者來說是明智的舉措。然而近幾十年來，哈佛的勞動法教授卻花費了大量時間在其他如體育法的議題上。真要說起來，許多教授會認為工會是個威脅，因為畢業生所尋求的是待遇更好的組織。

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像階級不平等正成為學術界不那麼突出的話題一樣，階級問題在美國社會中越來越迫切。如果問美國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他們最引以為傲的發展，許多人會回答是民權革命的推進。可以肯定的是，其實也並沒有什麼足夠的進展，正如最近的選舉事件所點出——而且婦女也繼續面臨嚴重的偏見問題。哈佛大學政治學者羅勃普特南(Robert Putnam)最近在 *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中所指出，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在美國能塑造人生機會的種族、階級和性別力量，已經相當大地改變了。」

如今種族通婚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可是跨階級的婚姻卻比以前少了。如果單親家庭的形成，過去曾經被種族高度預測，現在則是越來越與社會階層聯繫在一起。按種族劃分的房屋隔離正緩慢減少，而按收入隔離則在上升。黑人和白人學生之間的成就差距在逐漸縮小，可是在過去的 25 年裡，收入 - 成就差距反而擴大了 30%。

預期壽命的種族差距依然存在，而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安妮·凱斯(Anne Case)指出，最近幾年來的重大發現是白人工人階級的預期壽命下降了，反映了酗酒、藥物過量和自殺的蹂躪。當此調查結果公佈後，一些自由派人士立即表達苛刻的的種族解釋：如在 *是什麼在吞噬白人美國？*(*What’s Eating White America?*)中，賈里德·凱勒(Jared Keller)提及到了迪頓和凱斯的發現：「對於那些首先缺乏經濟實力的窮人，婦女和少數民族的優勢尤其令人震驚(只要看看茶黨運動的種族焦慮)。」顯然，我們相信，由於婦女和少數民族的獲益，白人工人階級正在緩慢地自殺。

自 2016 年選舉以來，精英對白人工人階級的鄙視程度只有不斷攀升。芭芭拉·艾倫瑞奇(Barbara Ehrenreich)指出，自由主義專家的分析歸結為：「他們有什麼問題？他們為什麼相信川普的承諾？他們是愚蠢或僅是可悲的種族

主義者？」在選舉之後，*每日科斯(Daily Kos)* 報刊登了一篇特別殘酷的文章，題目是「為礦工失去健康保險感到高興。他們正在得到所投的票會帶來的成果。」

對白人工人階級川普選民的反應，轉向了提出深刻的問題：為什麼種族和階級優越的白人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比起階級內疚感，似乎擁有更多種族內疚感？關於自由主義學術中對於白人工人階級的盲點，又該怎麼辦呢？

菁英學術界：屬於誰？

真正考慮入學招生階級劣勢的改變政策是重要的起點。在種族關係方面，哈佛教授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著名的“接觸假設(contact hypothesis)”表明，當不同種族的人在平等地位的基礎上接觸時，偏見就會減少。讓教授和同學們接觸聰明的工人階層背景的青年男女，可能會加深同理心，減少學者們將藍領人士用刻板印象定型為愚蠢或落後的可能性。

哈佛大學為其持久聲譽、在種族多樣性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2020 年入學的非裔美國人佔 13.7%，亞裔美國人佔 22.1%，西班牙裔佔 12.6%，美洲原住民或太平洋島民佔 2.6%。

哈佛的經濟結構看起來和美國本身的經濟結構相當不同。儘管近年來共同努力於增加給大學生的經濟資助，但仍然存在巨大差距。透過調查 1981 年到 1991 年間出生者，斯坦福大學的拉傑·切蒂(Raj Chetty)和其研究團隊發現，哈佛大學最富裕的 10% 的學生人數遠遠超過了其餘 90% 的總數。而從收入來看，哈佛大學收入頂端 1% 的學生人數和收入底層的 60% 佔了幾乎同樣人數。

其他菁英高等教育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的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所言，在某些法學院內，低收入學生的代表性和五十年前有色種族學生的代表性相當，也就是在民權革命之前的狀況。在一本最近的暢銷書*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Hillbilly Elegy)*中，傑德·凡斯(J. D. Vance)闡述在耶魯大學當法律學生時，身為低收入白人是如何感到格格不入：「耶魯法學院的人很少像我一樣。雖然因為常春藤聯盟對種族多樣性的著迷，看起來和我很像；但幾乎每個人——不管黑人、白人、猶太人、穆斯林、無論是誰——都來自從不需擔憂金錢的完好無損的家庭。」

菁英校園裡缺乏工人階級學生實際上會造成更廣泛的後果。這對教授的研究是不利的。這讓學者們更容易透過懶惰的刻板印象去描繪他們不認識的學生群體。這也使得教師更有可能避免談論階級上的難題。除此之外，由於師資本身主要來自菁英學院，所以當一個世代的校園缺乏工人階層學生，在往後會變成下一個世代的校園缺乏工人階級起源的教授。

對某些菁英大學的經濟隔離是許多招生政策的高度可預測的結果，這些招生政策結果通常不易收進工人階層的學生，特別是白人。雖然整體招生政策應該考慮到學生克服的經濟障礙，但是前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廉·鮑文(William Bowen)在 2005 年發表的研究分析發現，菁英學校實際上並沒有如此看重經濟劣勢因素。調查共 13 所菁英學院(包括哈佛大學)，鮑文發現，對於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學生來說，作為校隊運動員，入學機會提高 30.2%；身為少數族群成員，會增加入學機會 27.7%；身為校友子女，會增加入學機會 19.7%；身為第一代大學生，會增加入學機會 4.1%；然而位在收入最底層的四分之一，則完全沒有優勢。普林斯頓大學的湯瑪斯·埃斯本斯德(Thomas Espenshade)和合著者亞歷山大·雷德福德(Alexandria Radford)對菁英私立學院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當學術能力相同，中上階級白人相較低收入白人的入學可能性高了三倍。

想像一下，白人工人階層的學生會如何看待這些統計結果。校友子女偏好會是最大的打擊，因為這給予已經享有教育優勢的競爭對手多加上一分。(研究表明，校友子女偏好甚至未能提高校友的捐助支持。)同樣，種族考量顯然對於白人工人階層學生無太大幫助，因為實際上相對優勢的少數族裔學生往往會獲得幫助：鮑文和德瑞克·包克的研究指出，在菁英大學中有 86% 的非裔美國人屬於中層或上層階層。於是當一個煽動者出現並告訴白人工人階級，菁英們所建立的制度是用以對付他們的時候，白人工人階級選擇相信並跟隨他，這樣的現象有什麼好令人驚訝的嗎？

過去進步的領導人深知這一點。面對如何彌補美國歧視歷史的問題，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表示，基於階級的政策將不成比例地惠及黑人，但也會包括低收入白人。「這是簡單的公平問題，當美國創造性地提拔位居落後的黑人，也應該拯救那一大群被遺忘的白人窮人。」金恩也敏銳地意識到政治是如何遺漏弱勢白人，他寫道：「我認為，許多和黑人面臨相同經濟狀況的白人工人，會很難接受「黑人權利法案」，因為這個法案只特別關注照顧黑人失業等情況，卻沒有同時充分考慮到他們(白人工作者)的困境。」

我看到了金恩的遠見卓識——和羅伯特·甘迺迪的政治聯盟——去年當我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面對的觀眾是來自常春藤聯盟和其他選擇性菁英機構各種族的第一代大學生，我注意到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學生相較於其他種族仍不成比例，這反映了種族繼續影響了經濟地位的現實。然而這些學生令人欽佩地克服了困難，與觀眾群中也面臨教育不利的白人、亞裔學生充分聯合。這個群體代表的正是那些在波士頓校車危機中相互衝突的學生，如今他們在這裡正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提昇頂尖大學中經濟劣勢學生的數量。

2017 年的危機

菁英學校排除低收入和工人階層學生一直是嚴重的道德憂慮，而 2016 年的選舉則實際引爆了危機：我們現在面臨美國民主的真正危機。未能為中低收入白人提供更多通往成功的途徑，為美國第一個總統級煽動者開啟了趁虛而入的好時機。未能讓工人階級白人進入菁英大學的數字提昇到具有意義，使得教授們更難理解他們所處社會的疏離分化的大環境。對於美國民主來說，這並是不健康的事情，因為美國許多主要領導人對白人工人階級的了解，甚至要少於史蒂芬·巴農(Steve Bannon)這樣的白人民族主義者[M.B.A. '85]。

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選民於 1968 年轉而投向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這樣令人振奮的故事現在已經被顛覆，二十一世紀的華萊士版本 — 攻擊少數弱勢族群、新聞媒體和獨立司法機構 — 獲得了某些曾支持過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選票。

諷刺的是，菁英師資忽視白人工人階級，很可能會對教師所關注的種族和宗教少數族群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記者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 [博士'93，法學博士'12]在選舉後注意到，如果右派的主要罪惡是種族主義，左派的主要罪惡就是精英主義。羅伯特·科爾斯(Robert Coles)表示，這兩種罪惡是可以同時被避免的。如今被驅使著走向斷崖絕壁的學術界，會跟隨他的領導嗎？

[1] Middle America，常譯作「心臟地帶」「小鎮價值」「半個美國」「美國中產階級」「中間美國」「中美」「中部美國」，是美式英語中的一句俗語，用於描述地理上的美國大部分鄉村與郊區的文化狀態和區域特徵。此術語通常在與城市進行比較時提及：這兩種狀態反應的不同價值觀刻畫出美國文化上的分歧。